

## 爱情失落自暴自弃

1972年,21岁的我在常山县纺织厂当技术员,技术员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,我和车间一位秀丽的女工王燕(化名)恋爱了。我们的恋爱很甜蜜。1973年,就在我喜滋滋地筹办婚事的时候,王燕突然辞掉工作,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。

我如遭雷击!后来才知道,一个父亲很有实权的男青年看上了王燕,一定要娶她为妻,并承诺,如果答应亲事,不但可以给王燕调换一个好单位,而且可以为她弟弟(因患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)解决工作。王燕开始死活也不同意,但她的父母和弟弟觉得这是一次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机会,于是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,逼迫王燕接受了这门婚事。

当时,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苍白!那年的10月1日国庆节,是王燕新婚大喜的日子,我带了一瓶58度的白酒,独自来到我们经常约会的河边,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一下喝了半斤,以前从不沾酒的我,醉得一塌糊涂。就从这天起,我开始沉迷于烈酒之中。我喝的都是那种土制

白酒,价格低廉,酒精度高,而且,喝酒从来都不要菜,一仰脖子,大半瓶白酒就进了肚子。喝酒的量也越来越大,刚开始是半斤,后来是一斤,然后是一斤半、两斤。每一次,我都把自己灌醉。

那年元旦,我甚至醉卧在了人来人往的街头。

这段时间,我还染上了很重的烟瘾,抽的是最便宜的8分钱一包的“经济”牌香烟。

同事们都觉得我没出息,认为我不值得为一个女子而堕落。但我怎么也听不进去,依然沉沦于绝望和愤恨之中。久而久之,大家也懒得管我了。

过度的烟酒,侵蚀了我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,我患上了多种疾病:贫血、气管炎、肺气肿、肝增大、胃溃疡、高血压……我消瘦,浑身无力,整夜失眠。20多岁的人,看上去像一个40出头的半老头子。一次,我竟昏倒在车间里,被工友们送进医院。

由于我过度地沉迷于酒精,已难以胜任技术员的工作,厂里将我分到了锅炉房,负责为工友们烧开水。



## 五张嘴的沉重负担

两个家变成了一个家,原来的1张嘴,也就变成了5张嘴。我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。那时候上班的人只靠一点工资,没有外快可赚。没办法,我决定先戒烟,省下一部分钱。

我刚开始戒烟时,心里像被猫抓一般,非常难受。常常,何勇会用报纸托着一撮黄色的烟丝递到我手中,说:“叔,你抽吧。”何勇3兄弟见我烟瘾上来很难受,就背着我去街上捡别人丢掉的烟屁股,然后搓出烟丝,集中在一起给我抽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,我正在家里劈柴火,何伟匆匆地跑了回来,拖着哭腔说:“叔,你快跟我去吧,何勇、何建被人打了。”我随着何伟赶到那里时,只见他们兄弟俩正被3个20来岁的男青年按在地上没头没脸地打。原来,他们3兄弟到汽车站给我捡烟屁股。在候车室发现一包尚未开封的“西湖”牌香烟,捡起来正兴高采烈地想回来给我,被3个男青年看到了,硬要从他们手中抢走。3兄弟不愿意,他们就打开了。

3个男青年怎么是他们的对手?为息事宁人,我只好让3个男青年把烟拿走,3兄弟十分委屈地哭泣。

领着3兄弟回了家,我打来水给他们擦身子。看着他们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,心里很不好受。我问他们:“痛不痛?”3兄弟虽然痛得“咝咝”倒抽冷气,但还嘴硬:“不痛,叔,一点也不痛。”

我戒烟的决心是在那一刻下的。但我微薄的工资还是填不满5张嘴。后来,我又决定把酒也戒了。

戒烟戒烟还难受,嘴巴里一点滋味也没有,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。每次坐到饭桌上,我的手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拿酒瓶。为了让自己断了喝酒的念头,我在酒瓶子自灌进了辣椒水,如果情不自禁喝到嘴里,就辣得面红耳赤。

刘芳看不下去,就偷偷地打来酒,吃饭时给我倒在碗里,哽咽着说:“老张,你喝吧,别为了我们委屈自己了。”嗅到酒香,我的口水都溢出来了。但我控制住自己,将酒碗与酒瓶一股脑地丢到了门外,大声嚷嚷:“谁让你们给我打酒的?谁让你们给我打酒的?”刘芳捂着脸哭了,3个孩子吓得躲在一边不敢出声。其实我并没有生他们的气,我是在提醒自己要留后路,我把全部的工资都交给了刘芳,口袋里一分钱也不放。两个月后,我成功地把10多年的酒瘾也戒了。此后,我们偶尔也能吃上一顿饺子,还是豆腐韭菜馅的,虽然没有肉,但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。

本版插图  
杨宏富

## 苦命人合在一起过

一晃,就是1980年,我也到了而立之年。

一天晚上,我正在家里独自喝闷酒,房东刘叔推门走了进来。他说:“这个月轮到收水电费和水费,等会儿你辛苦一下,收齐了交给我。对了,隔壁徐文一家前不久搬走了,住进了另外一家人。唉,真是一个命苦的女人。她丈夫在一次车祸中死了,女人没有工作,靠捡废品为生,还带着3个小男孩,日子怎么过啊?”刘叔走后,我摇摇晃晃地踩着醉步去隔壁收水电费。这女人30来岁,面色苍白,男孩们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,脏得像泥猴。

女人见我来收钱,苦着脸说:“能不能再缓几天交钱?”“不行,人家都催好多次了。”我说。女人从口袋和抽屉里,一张毛票、几枚硬币地凑,终于将当月的水电费交齐了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,我下班回家,刚打开房门,看到隔壁那个最大的8岁男孩正掀开我床上的席子,准备拿走我压在下面用来买酒喝的10元钱。那时候,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2元。我非常生气,冲上去打了男孩一个巴掌:“你这个小偷,竟然偷我的钱……”男孩被打倒在地,捂着脸哭了。女人闻声跑过来,后面跟着另外两个男孩。女人两膝一软,在我面前跪了下来……

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挥挥手让他们拿上钱快走。当天,我没钱买酒喝,就早早地躺在了床上。正迷迷糊糊间,那8岁的男孩怯怯地走了进来,手中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:“叔叔,你吃饺子。”我没有理睬他,依然闭着眼睛装睡。男孩在我床前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,然后轻轻地

将饺子放在了桌子上。等男孩走后,我感觉自己的肚子真的饿了,就爬起来吃饺子。饺子是豆腐韭菜馅的,虽然没有肉,但我吃得非常香。

1980年的除夕之夜,喝了一斤白酒的我正要上床睡觉,突然,肚子痛得像刀绞一样,我从床上滚到了地上,并大声地呻吟起来。正当我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,门被人撞开,女人带着那个8岁的男孩,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我扶上用来收破烂的平板车,然后把我送到县人民医院。

是胃穿孔!那个春节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,病人们都被家人接回去过节了,医院里显得十分冷清。隔壁的女人带着3个男孩天天守在我的病床前,给我送吃的喝的。有时候,她还带一篮子的布头,坐在我的病床前缝补衣服。3个男孩围在病床前,一边给我讲故事,一边用小手给我揉背,轻轻的轻轻的,似乎怕弄痛了我。这样的场景真的令我十分向往。

10天后,我的病情有了好转,又是女人带着3个男孩把我接回家。那一顿饭是在她家里吃的。她烧了蒜苗炒豆腐、土豆丝,还有一碗冬瓜汤。我说:“这几天多亏了你们。”女人笑了一下,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房东刘叔知道后,就有意把我们撮合在一起,他说:“你们就一起过吧,相互之间也有个照顾。唉,都是苦命人,合在一起熬吧。”这句话,几乎把我的眼泪都说出来。

女人的名字叫刘芳,3个男孩分别叫何勇、何建、何伟。刘芳后来曾经征求我的意见,要不要让3个孩子随我的姓。我说:“千万不行,他们地下的父亲会伤心的。”

1980年清明节前,我把一个门封掉,打了一个窗,原来的两个家变成了一个家。

# 爱,让我健康

口述  
张涌泉  
撰稿  
马朝虎

## 心里像被小手轻抚

在一起生活,孩子们跟我的感情越来越深。一个星期天,我看到3个孩子又在河边玩泥巴,把身上的衣服弄得脏兮兮的,就对他们说:“何勇、何建、何伟,我带你们去公园玩。”3个孩子听后,高兴得大叫起来。

在公园里,我给他们讲了几个故事,还陪他们玩了一会儿捉迷藏。回家路上,何勇问我:“爸爸,我们什么时候再来玩?”何建和何伟也应和着说:“是呀,爸爸,过几天你还带我们来玩好吗?”

我听后愣了好长时间,这以前,他们一直叫我“叔叔”。我往前后左右看看没有别人,这才有些心虚地应了一声。这一答应,我感觉心里像被一只小手轻轻抚过一般,眼眶不觉有些潮湿,怕让孩子们看见,我偷偷地擦掉了。晚上躺在床上,我对刘芳说起了白天的事情,刘芳也哭了。她说:“这辈子我们都欠你。”我开心地说:“一点都不欠,我是他们的爸爸!”

1982年,何勇到了上学的年龄,跟他一样大的孩子,已经背着书包上小学二年级了。何建和何伟也快要上学了,我想,我这辈子已经完了,但孩子们的前程不能耽误,即使再苦再穷,我也要把3个孩子送进学校的大门。

我那点工资变得更加捉襟见肘。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,刘芳也到一个建筑工地打临工。

## 把二郎腿架得高高

我去同事和熟人那里终于借来了孩子们的学费。为了尽快把钱还上,同时也为了准备孩子们以后上学所需的钱,我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赚钱。

我去乡下贩过鱼,也上山挖过草药,但都没能赚到钱。正焦急的时候,听说一个原来踩人力三轮车的邻居最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我就让他把那辆旧人力三轮车转手给我。这位邻居知道我口袋里没钱,怎么也不肯转让,后来索性漫天要价,说转让费要300元。其实这种三轮车,当时的转让价最多只要200元。我咬咬牙同意了,但我确实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。我就对他说:“这车400元转让给我好了,但要半年才能付100元。”邻居一听半年可以多出100元钱,就同意了。

之后,只要一下班,我就去码头载人运货。我拼命地踩着三轮车,气喘吁吁,累得够呛。刚开始时,每次我只能载300公斤的货,到后来,能够载700公斤。码头到货场有一公里的路,刚开始我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,到后来,半个小时可以运两个来回。从码头运500公斤货到货场能拿到3元钱,第一个月,我就把400元的三轮车的转让费还掉了。

踩三轮车是强体力活,每天

刘芳老得真快,头发都花白了。

1989年,何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所重点中学,何建已经上了初中,何伟也小学快毕业了。那个夏天,我为3个孩子新学期的学费在发愁,到处向同事和熟悉的人借钱。刘芳知道这些事情后,笑着对我说:“老张,孩子们上学的钱你甭管了,我有办法。”

9月1日开学了,连着几天,我都发现何勇、何建、何伟和刘芳一起出门一起回家,还带回一身臭汗,我觉得很奇怪。那天早上,我跟在他们后面,要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我看到何勇、何建、何伟跟着刘芳来到一个建筑工地,然后开始搬砖头、拌水泥,原来他们没去上学,在这里做小工赚钱。

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沉着脸走了过去,朝何勇、何建、何伟的屁股上各踢了一脚,孩子们和刘芳都非常吃惊地看着我,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打他们。我不理他们,右手拉着何勇,左手拉住何建和何伟转身就走。刘芳跟在后面,气喘吁吁地问:“你干什么?”何勇也问我:“爸爸,你要带我们去哪里?”我还是不搭理他们,一直把他们送进各自的学校。刘芳什么都明白了,她哭了:“他们又不是你的亲生儿子,你无权管。”我说:“谁说他们不是我的亲生儿子?你没听到他们叫我爸爸吗!”

一回到家里,灌下一大缸开水,扒拉下三大碗干饭,把赚来的钱交给刘芳后,我就倒头呼呼大睡。

刘芳心疼我,每天在床上,一边替我揉酸痛的身子,一边哭着说:“老张,你原来身体就差就弱,这样下去,你会垮掉的。”

我说:“孩子是我们的,不能让他们以后吃苦。”我还把衣袖和裤腿捋上去,露出晒得黑黑的胳膊和腿,笑着对刘芳说:“你没有发现我的胳膊和腿比以前粗了,身上的力气比以前大多了。”

3个孩子都很懂事,知道心疼我。他们一放学,特别是双休日,都跑来帮我做事。遇到拉重货,他们就在后面推车。我不希望他们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,就赶他们回家复习功课,但他们不听,怎么赶他们也不肯走。

到了回家吃饭的时候,3兄弟就把我让进“车厢”里,说:“爸爸,你累了,你歇会儿,让我们来拉你。”就这样,老大何勇在前面掌车龙头,老二何建、老三何伟一左一右推着车,一边还高兴地大喊大叫:“我们回家了,我们回家了。”每当这时候,我心里甜滋滋的,故意把二郎腿架得高高的。在码头拉货的同伴非常羡慕我,说:“老张,你有3个好儿子啊!”

## 还想带我的孙子呢

一年又一年,何勇、何建、何伟都长大了,而且都非常争气。1992年,老大何勇考取了本省的一所重点大学;1994年,老二何建考取了北方的一所大学;1996年,老三何伟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,毕业后都有了一份好工作。

我和刘芳也慢慢地老了。

去年8月份,我60岁生日那天,何勇、何建、何伟3个一定要带我和刘芳去省城杭州游玩。到了杭州,他们带我去浙江第一人民医院作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。我知道自己一身都是病,怕孩子们为我担心,死活不愿意去医院。最后,孩子们是架着我去的。等检查结果出来时,刘芳和孩子们都开心地笑了,而我却呆住了:一切正常!贫血、气管炎、肺气肿、肝增

大、胃溃疡、高血压等疾病不知在什么时候全部消失了!

他们拥着我进了一家酒店,订了蛋糕,叫了满满的一桌子菜。孩子们还要了一瓶五粮液和一条中华烟,然后对我说:“爸爸,你为了我们,连烟酒都给戒了,今天是你的生日,就喝一点好酒,抽几口好烟吧!”我推开烟酒说:“我不会再碰它们了,我还想健健康康地多活几年,带带我的孙子孙女呢!”

说这话时,我的眼中忽然落出几颗泪珠。孩子们吃了一惊,连忙问:“爸爸,你怎么啦?”

“我真高兴,我真的很高兴!”我说,“我懂了,跟你们一起过的几十年,我终于懂了。原来——爱,能够让让人健康!”

